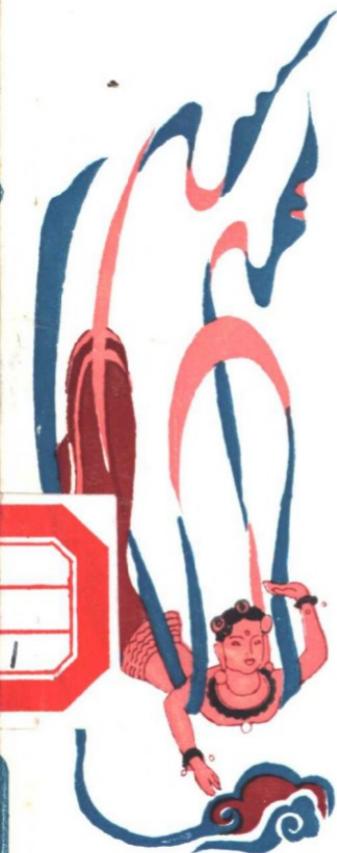


■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

话 说 敦 煌

主编 王绍曾 罗青
荣新江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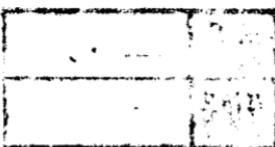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话 说 敦 煌

荣新江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济南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王绍曾 罗青 主编

话 说 教 声

樊断江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北京·天津)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印张 8插页 76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28—0902—1/G·751

定价 1.60元

出版说明

近几年来，国内文化界对编写“中国文化史”引起普遍重视。许多专家、学者在讨论如何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要广泛深入地宣传、介绍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化，来激发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我们这套《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而编写的。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曾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作为炎黄子孙，无不为此而骄傲。同时，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古老文明，都是我们的祖先长期奋斗、积累的结果；没有斗争，没有创造，就不会有悠久的灿烂文化。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个光辉的传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把我们的聪明才智，无私地献给祖国，为两个文明建设，为人类文明，继续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部中国文化史，涉及到许多专门学科，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这套丛书不可能兼收并蓄，只能就文化史上较为重要、较为突出，并为大家感兴趣的专题，分别作系统的重点的介绍，大体上包括考古文物、科技发明、典章制度、图书典

AJ74/2 06

5

籍、文教艺术、衣食住行、风俗礼制、宗教信仰、中外交流、医疗保健等各个领域。这些领域，曾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和探索，但作为普及文化史知识而编写的成套读物，过去很少有人做过，我们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我们这套丛书的特点是通俗好懂、生动具体，图文并茂。力求做到科学性、通俗性、趣味性的结合。同时尽量反映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以适应各个层次读者的阅读。这套丛书，每册一般六至七万字，将分批陆续出版。

这套丛书，在编辑过程中，先后参加工作的还有鲁军等同志。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错误，希望在读者的帮助下得到改进。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

目 录

一、从敦煌郡的建立说起.....	(1)
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	(6)
三、藏经洞的发现.....	(11)
四、敦煌文献的被盗.....	(15)
五、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	(24)
六、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石窟艺术风貌.....	(29)
七、莫高窟的佛塑艺术.....	(38)
八、灿烂辉煌的敦煌壁画.....	(45)
九、丰富多彩的石窟装饰图案.....	(57)
十、富于历史价值的题记.....	(61)
十一、莫高窟以外的石窟群.....	(66)
十二、藏经洞中的稀世之宝.....	(72)
十三、重见天日的敦煌古籍.....	(80)
十四、敦煌文献中的民俗资料.....	(88)
十五、俗文学的新天地.....	(95)
十六、古代科技文献的宝库.....	(105)
十七、敦煌学的世界热潮.....	(111)
十八、我国敦煌学研究的今天和明天.....	(117)

一、从敦煌郡的建立说起

敦煌，位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联接着东西文化交往的丝绸之路。敦煌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她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敦煌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当时，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人，他们游牧在以敦煌和祁连山为中心的地区，势力十分强盛，就连蒙古高原的强悍民族匈奴，也不得不把首领的儿子送到月氏那里去当人质。秦汉之际，匈奴在首领冒顿的率领下强大起来，先是打败了东胡，夺得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又向西击溃月氏，迫使月氏人大举西迁，河西走廊成了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控制的地区。新兴的汉王朝也倍受匈奴的侵掠，由于没有力量反击，只好用和亲、赠物的方式换取短暂的和平。

汉朝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渐渐富强起来。汉武帝即位后，开始反击匈奴。公元前121年春，将军霍去病率军越过祁连山，直接进击河西的匈奴。同年夏，霍将军再次进入河西，给匈奴的统治以重创。匈奴浑邪王率部下四万余众投降汉朝。从此，河西归入汉朝的版图，汉朝在这里陆续设立

了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并把长城从东一直修筑到敦煌以西，还在敦煌郡城西设立玉门关和阳关，扼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大门。敦煌郡的设置年代，《汉书·武帝本纪》说是元鼎六年（前111），同书《地理志》又说是后元年（前88-87），还有一些说法介乎两者之间，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意见。敦煌郡是从酒泉郡中分离出来的，是随着汉朝军事力量的向西开拓和灌溉的发展而开设的，开始时只是很小的一个郡，但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很快就发展起来了。西汉时的敦煌郡，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个县，包括今敦煌、安西两县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一部分。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敦煌有11200户，人口38335，每户不到四人，虽然从人口密度来看，每平方公里只有0.3人，但这些人口集中在六个县中，比以前要多得多了。人口的增长推动了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生产的提高，敦煌六县之一的“效谷”，就是由于任鱼泽尉的崔不意，“教民力田，勤效得谷”而得名的，反映了敦煌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西汉进取西域的必要条件。公元前104年李广利再次西征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时，敦煌就安排了兵六万人，马三万多匹，其他牲畜数以万计奔赴前线。为了巩固这一基地，汉朝一面迁徙贫民、囚犯来此定居；一面征发大批士兵到此戍守。中原汉族民众的到来，改变了河西的民族布局，推动了生产飞跃发展。自从建郡以后，敦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汉末，中原动乱，河西却富庶平安，许多中原大族避

乱西迁，在河西定居下来。东汉时，河西东部常常受到羌人起兵的扰乱，敦煌却相对比较平安。同时，因为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逐渐崩溃，敦煌太守就成了汉朝在西域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实际负责人。清朝初年在新疆巴里坤湖畔发现的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就是进击匈奴呼衍王的记录。敦煌可以说是当时统治西域的军政中心。

东汉末年，中原军阀割据混战，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敦煌在曹魏的统治下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晋虽有短暂的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291—306）、永嘉之乱（311），接着西晋灭亡（316）、晋室南迁（318），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批中原的士人逃到河西。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在前期，敦煌仍然是控制西域的重镇，特别是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的到来，促进了敦煌的开发，《沙州图经》记载了当时水利工程的兴修，标志着耕地面积的扩大。中原的高层文化也随着士人来到这里，前凉、西凉和北凉的统治者都能尊重、保护知识人，为他们教授生徒和著书立说提供良好的条件。如敦煌效谷人宋纤，就有受业弟子三千余人。当时敦煌的文化水平，并不亚于中原北方甚至东晋南朝，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宋纤、郭瑀、刘昞、阚骃、索敞、宋繇、张湛等，他们的某些著作曾传写到南朝，有些人则由北凉入北魏，为魏周乃至隋唐制度、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十六国后期，在北凉灭西凉和北魏灭北凉的过程中，敦

煌遭到部分破坏，显出衰落的景象。北魏从五世纪中叶占领敦煌后，在此设镇，成为抗击北方强敌柔然的前沿阵地。到五世纪末，柔然衰微，敦煌社会重新安宁，生产也有了发展。524年，敦煌镇改为瓜州，经西魏、北周，又成为统一的隋朝的西部重镇。隋炀帝虽然想以敦煌为基地进取西域，但他的暴政引起全国的反抗，敦煌也落入割据河西的李轨的势力范围。

622年，唐朝占领瓜州，改名为西沙州，又在下属的常乐县设瓜州。633年，改西沙州为沙州，敦煌开始进入兴盛的时代。从640年开始，唐朝的势力开始进入敦煌以西的西域地区，灭高昌（今吐鲁番盆地），攻焉耆，破龟兹（今库车），到658年，终于从西突厥汗国的手中取得了西域各国的宗主权。敦煌又一次成为中原王朝进军西域的物资供应基地，而且沙州刺史也率兵亲自参加了战斗。在以后唐朝和西突厥余部以及新兴的吐蕃争夺西域控制权的斗争中，敦煌仍是协助驻扎龟兹的安西都护府统治西域的重要力量。675-676年间，唐朝还把西域南道上的石城镇（今若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直接管辖，标志着敦煌实力的增强，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前期的敦煌，水渠灌溉系统相当完善，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粮食生产不断增长，商品经济也随着走向繁荣。市场上有中原的丝绸、瓷器，有西域的玉石、珍宝，有北方的驼马，也有当地的粮食。经济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丰富了敦煌的文化内容。沙州城内有州、县两级学校，教授唐朝规定的儒家经典，大量的宫廷写经从

长安传入，给这座佛教圣城进一步灌注了汉地佛教的影响；因为李唐王室奉老子为先祖，敦煌建立了“神泉”等道观，教授弟子，传写经书。此外，敦煌城东，立有中亚粟特人信奉的祆（xiān）教（拜火教）神祠，藏经洞还出土过景教、摩尼教残经，透露了西亚、中亚宗教在这里传播的信息。可以说，唐代的敦煌地区，凝聚了中国、印度、中亚、西亚等多种不同系统的文化，呈现出异彩纷陈的文化景观。

755年安禄山叛乱，河西的唐军劲旅都前往中原赴难，吐蕃王国乘虚而入，占领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西域地区，吐蕃的统治阻碍了敦煌的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但却使佛教取得了独尊的地位。848年，吐蕃内乱势衰，敦煌的土豪张议潮乘机率众起义，夺取政权并攻占了周围一些州县，遣使归降唐朝。851年，唐朝在敦煌设归义军，从此开始了延续近200年的归义军时期。在九世纪中叶，正是吐蕃衰退，蒙古高原的回鹘西迁，各种地方势力如退浑、龙家、党项、萨毗、仲云、南山纷纷兴起之时，归义军在敦煌豪族张氏（自张议潮至张承奉，851-914年任职）领导下，保住了以瓜、沙二州为中心的汉人政权，也保住了高度发展的敦煌佛教文化遗产。五代、宋初，归义军在敦煌另一个大族曹氏（从曹仁贵至曹贤顺，914-1023年后不久任职）领导下，注重文治，用和亲的方式，与周边民族搞好关系，又加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使敦煌的汉化佛教，回光返照式地经过了它的最后繁盛期。到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后，随着中国西北政治中心的转移和丝绸之路的改道，敦煌逐渐失去了她的重要

地位，终元、明、清三朝，敦煌在文化史上没有什么建树。

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派兵正面进攻匈奴的同时，还作出一个伟大的战略决断，派人到西方去联络被匈奴打跑的月氏人，请他们返回原来的居住地，以切断匈奴的“右臂”。前138年，汉中人张骞应征前往，（图1）历尽艰辛，经匈奴、大宛、康居等国，来到阿姆河北岸大月氏的住地。张骞虽然没有得到大月氏的许诺，却了解了大量的西域地理和文化知识，探知了匈奴西部的虚实，他带回来的情报，为将军霍去病夺取河西走廊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张骞西行的壮举，在历史上首次打通了联系中原与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开始了中西文化交往的新纪元，因此，史书上把这一壮举称之为“凿空”，意思是说张骞开辟了通往西方新天地的道路。

汉代的丝绸之路，始于都城长安（西安），经咸阳，一条路沿泾河而上，经固原、景泰进入河西走廊，另一条路沿渭水西行，经陇西、金城（兰州）进入走廊。沿走廊西行，经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由敦煌西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鄯善、于阗（和田）到莎车，逾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大月氏、安息（波斯）等国，叫作南道。另外，由

敦煌出玉门关，沿天山南麓，经车师前王庭（吐鲁番）、焉耆、龟兹到疏勒，越过葱岭，进入大宛、康居、奄蔡等国，叫作北道。沿着南北两条丝路干线，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成为罗马帝国时髦的服装原料。同时，西方各国的珍禽异物，宗教思想，也陆陆续续流入中原。位于丝路干线上的敦煌，很快就成为东西方的贸易中心和商品中转站。

东汉时，河西东部时有骚乱，西域各国入朝的王子，都留居在敦煌。随之而来的是大批的商胡。在东汉末年，敦煌的大姓势力雄张，乘着中原战乱，敦煌二十多年没有太守的机会，兼并土地，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前来贸易的西域商胡也备受欺诈。227-233年间，曹魏派仓慈出任敦煌太守，他有力地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西域商胡前往内地买卖提供种种方便，使敦煌成为汉族和胡人密切交往贸易的一个都会。据认为是写于西晋末年的“粟特文古信札”，记载了中亚粟特地区来的商胡从敦煌前往金城销售大麻织物和毛毡的情况，描绘了敦煌本地商业兴盛的景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的动荡岁月，却给佛教在敦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机。两汉之际，佛教已经从大月氏国，经敦煌等地区传入中原，和其他中国传统神仙方术一起，在东南沿海一带流传。相反，从敦煌北长城沿线出土的大批简牍文书来看，两汉之际，敦煌主要是一个贫民、士兵屯戍的兵站，没有传播佛教的文化基础。汉末魏晋时期，随着中原大族的到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佛教很快就传播开来。西晋时，有高僧竺法护，率领一批弟子在这里译经布

道。人们称之为“敦煌菩萨”。他的弟子竺法乘，也在这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海而不倦”。前凉时，又有高僧单道开、竺昙猷等人，在敦煌修习禅法。据698年立的《大周李君修功德记》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有一个叫乐僔的沙门，杖锡来到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麓，忽然眼前一亮，金光灿烂，好象有千佛在金光中显现。于是，乐僔就在悬崖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所佛窟。不久以后，又有一位从东方来的法良禅师，在乐僔的窟旁，又营建了一个窟，从此，开始了近千年的敦煌石窟艺术创造。十六国时期，敦煌的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到北魏平北凉之前，这里已是“村坞相属，多有塔寺”了，至今，还有三座属于北凉时期的小佛塔保存下来。

北魏虽然统一了包括敦煌在内的北方，但由于柔然的不断南侵，敦煌在五世纪后半叶社会仍然动荡不安。佛教却沿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发展势头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北魏王朝对敦煌的直接统治，为敦煌地区带来了中原的文化艺术。敦煌藏经洞保存了479年北魏附马都尉冯熙在洛州写的《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莫高窟还发现过487年北魏广阳王慧安发愿绣的佛像残片，就是从当时的都城平城带到敦煌的。524年以后，东阳王元太荣亲自出任瓜州刺史，使北魏王室和敦煌佛教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东阳王在敦煌做了大量功德，抄写了一大批佛教经典，还在莫高窟开凿了一个大窟。北周时，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也在莫高窟开凿了一个大窟，这些王公贵族的作法，给当地各阶层民众作了榜样，上行下效，不

久就在莫高窟掀起了一个造窟热潮。

隋朝统一南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隋文帝佞佛，601年，诏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即莫高窟）起塔，安放从首都送来的释迦舍利骨。在隋朝统治者崇佛浪潮的推动下，敦煌各阶层民众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仅在莫高窟一处就开凿了七、八十个洞窟。隋炀帝即位后，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人，联络各国首领。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记载了当时的丝绸之路走向：从敦煌出发，直到西海（地中海），有三条路。北道从伊吾（哈密）越过天山，沿草原之路西行，经过铁勒、突厥等游牧民族地区，一直到达东罗马；中道从高昌（吐鲁番）西行，经焉耆、龟兹、疏勒，翻过葱岭，经瓦汗山谷，进入粟特地区，直到波斯、地中海；南道从鄯善到于阗、朱俱波（叶城）、喝槃陀（塔什库尔干），逾过葱岭，经瓦汗山谷，经吐火罗地区，进入印度。三条道路，分别以伊吾、高昌、鄯善为门户，但“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清楚地说明了敦煌在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往中的重要性。

唐代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典型的文化都会，汇聚了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招徕了不同血统的民众在此定居，当时位于敦煌城东的敦煌县十三乡之一从化乡，就是由陆陆续续定居下来的粟特商人组成的，沙州所辖的石城镇和播仙镇，更是由中亚康国人和何国人分别任首领的，这些号称是“陆上腓尼基人”的粟特商人，除了从事国际间转手贸易

外，还是传播文化的友好使者，他们有的信奉正统的波斯拜火教，有的却皈依了曾经受到禁止的摩尼教，有的还接受了汉化佛教，并把这些信仰传播到四面八方。

在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的形势下，敦煌莫高窟也不停地修建，到武则天执政时期，已经是有一千多所窟龛的雄伟寺院了，当时人称颂道：“升其栏槛，凝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游神乎天上。岂异夫龙王散馥，化作金台；梵王飞花，变成云盖。”真仿佛是佛国仙境。

敦煌是在坚守了十年之久后，才向吐蕃军队投降的，这也可能是吐蕃君臣不忍摧毁这座佛教圣城的缘故。吐蕃在河西的统治中心是凉州和瓜州，敦煌则成为吐蕃佛教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汉族僧人摩诃衍在沙州降蕃后，奉吐蕃赞普诏命，远到逻娑（拉萨），传授汉地顿悟禅法。敦煌的另一位高僧昙旷，曾撰写《大乘二十二问本》，回答赞普提出的有关佛教顿渐之争的疑难问题。敦煌的佛教在吐蕃的保护下迅速膨胀，僧尼人数遽增，大寺陆续兴建。

归义军建立后，在文化方面恢复了对学生的儒家经典教育，但在宗教上，仍延续吐蕃的独尊佛教的作法。张氏时期，在敦煌莫高窟兴起了一个新的造窟热潮，有人称之为“敦煌千佛洞的中兴”。曹氏时期继续这一作法，在莫高、榆林两地，修建或改造了许多洞窟。而且，敦煌还和中原王朝、甘州、西州、于阗等地方政权保持着互送佛典的关系。当时，虽然有西夏、回鹘等民族的劫掠，阻碍着丝路的通畅，但敦煌官府还是安排了东往西来的一批批使者、商人和取经僧人，

继续发挥着在丝路上转输商品、传播文化的作用。

西夏占领瓜沙后，征发百姓去进攻宋朝，敦煌日趋衰落。特别是南宋时，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取代了陆路而畅通起来，敦煌逐渐失去了在丝路上的重要地位。蒙元时期，北方草原之路联接了大都（北京）、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和林遗址）和中亚，敦煌被弃置一旁。明朝划嘉峪关为界，敦煌成为边外荒凉之地，从嘉峪关通哈密的路成为中原与中亚往来的干线，敦煌彻底失去了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西夏到元，敦煌还不断有小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但艺术上却越来越没有生命力了。

三、藏经洞的发现

敦煌之所以在荒凉了几百年后重新受到重视，甚至在国际上出现了一门新的显学——“敦煌学”，这是和藏经洞的发现分不开的。

藏经洞是敦煌莫高窟中一个很小的洞窟，现编号是第17窟，它是在第16窟的甬道北壁上开凿出来的，实际是附属于16窟的耳室。（图2）16窟是莫高窟北端的一个大窟，原名叫“吴和尚窟”。吴和尚的法名叫洪辩（誓），在吐蕃统治敦煌末期，他就是沙州僧团最高的领导人都教授，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在张议潮领导人民推翻吐蕃统治的斗争中，他